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1 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问世的时候恰逢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消失了；其二是，出现了几乎是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诚然，所谓经济危机也是一种政治、道义和思想危机，使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构成西欧生活基础的那些政治和思想结构产生了怀疑。显然，在法西斯独裁政权消失的过程中，内部因素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其它一些比较普遍和具有国际性质的因素也起了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北美帝国主义遭到了削弱，以及它无法保持其对欧洲的支配权和控制。人所共知，美国政府、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利用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作为保持其支配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我并不是说这些独裁政权只是

工具而已，但我确实认为，美帝国主义对延长这些独裁政权的寿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就西班牙的情况而论，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连西班牙人也不否认。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为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欧洲的力量对比中出现某些变化开拓了道路。正是这次失败直接造成了法西斯独裁政权被基于普选和尊重人的自由的政权所取代。

至于经济危机，我们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大萧条的重演；我们所经历的并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当前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应付现代生活中的问题，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也有把民主扩大到人民群众各阶层使他们能充分参加国家生活的问题，还有建立大众文明和环境之间的新关系的问题。

欧洲社会的这种危机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说明已演变到三十年代导致欧洲政治中出现法西斯主义和极右势力猖獗的那种绝望情绪。当然，有一些象恐怖主义这样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在某些情况下，从这些征兆背后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想要看到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人的凶相。也不能否认的是，各处的右翼势力都在各级议会选举中

增加了自己当选议员的人数。尽管如此，总的趋势是，设法用进步的左翼的办法去解决欧洲的问题。如果要解决这场危机，单纯地回到过去是不行的。

这场危机的根源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初级原料，而不仅仅是石油（尽管这是极为重要的），由于这一点，它们可以对世界经济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这场世界危机需要一种新型社会。而这也正是欧洲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如果有人要求为欧洲共产主义下个简单的定义，那么我说：欧洲共产主义就是已在若干共产党中兴起的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政治和战略思想的集合体，设法给当代的危机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新的对策；设法借助于民主方法去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向一种建立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由、多元论和改善所有人的社会待遇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简言之，欧洲共产主义是要结束人对人的剥削。换句话说，欧洲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民主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欧洲共产主义认为，在西欧的工业发达社会中，民主是战胜当今被大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控

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办法。它认为，能够取代当前制度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是一种民主能在其中得到最充分体现的社会主义。

可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所说的是否都正确？他们在谈论“共产主义的新面貌”时是否是真心诚意？抑或欧洲共产主义是个骗局？它是否（象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不久前所说）只不过是“一个特洛伊木马”？

关于这种论调的一件怪事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两种完全不同、毫无共同之处的反对者利用了这种论调。我要说明的是，苏联的攻击（所谓“苏联”，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东欧国家中的报刊宣传）大肆宣传这样一种说法，说什么欧洲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发明和推销的一种定时炸弹，为的是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从北美和其它西方来源收到的官方和半官方言论中，欧洲共产主义却被描述成一种不择手段的策略，目的在于让披着羊皮的狼打进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堡垒。

一种论点同时受到如此不同的两方的利用，确实是一种少有的、并非不受欢迎的巧合。这意味着，欧洲共产主义既然从这两种意义上说都不

可能是一种策略，因此，它就决不是什么策略，而是一种有根据的、新型的、产生于欧洲现实的东西。它是要设法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

对那些指责我们只不过是玩弄策略的人，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要说些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答复就是说出简单的真理，这个真理（任何真正的历史学者都可以亲自检验它）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地位是一种长期过程、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的结果，它是在一条复杂而艰难的道路上逐渐形成的。

因此，我认为现在提出我对欧洲共产主义起源的看法是适宜的。下面我想把比较远的起源同实际形成当前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比较直接的影响这两点分开来谈。

先谈比较远的背景。我们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我们的起点。众所周知，我们的起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了，亦即当时还把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工人党派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党国际瓦解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社会党是站在各自政府一边的，国际联系已经破裂。工人之间的相互国际声援的概念已化为乌有。

在瑞士举行的一些有列宁参加的会议上，已

开始从小组的形式出现了共产党的雏形，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在战争过去之后重建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国际联系。列宁在这些会议上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他所希望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最虚弱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梦想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变成了现实，被击溃的沙皇军队变成了革命因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出了力。俄国的榜样，冬宫的被攻克，列宁的理论，苏维埃——所有这一切给了各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直到今天以思想理论上的启示。因此，俄国革命获得了奇妙莫测的神话的地位，鼓励了革命斗争，给全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增添了希望。

俄国革命的成就由于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粉碎革命运动（德国皇帝倒台后，这些革命运动企图改造德国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变得更为突出了。俄国革命胜利了，而领导年轻的魏玛共和国之社会党领导人却迅速把德国的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把这两者作一番比较，就必然会使处于早期的共产党在其历史的一段很长时期中，必须把“苏联典型”看作是用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有生命力的典型。

不消说，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必须与之作斗争的一些客观条件，同采用“俄国典型”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和政治基础之间是有某种矛盾的，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有矛盾的。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若干共产党的党史，我们就会发现，从它们开始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些同“俄国典型”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格格不入的有趣做法。

这篇文章不打算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下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作的伟大理论价值。他不顾多年的监禁和随之而来的同外界保持接触的困难，研究出了若干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够比共产国际的发号施令更成功地适应西方社会的条件。

当然，斯大林主义用镇压以及经常是残忍的办法破坏了一些共产党的非正统的首创精神。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的某些现象必须更为仔细地予以研究，因为这些现象用过分简单化的片面的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比方说，人民阵线这种策略显然有利于苏联把尽可能多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去对付希特勒主义已开始向苏维埃制度本身发出的威胁。可是，又出现了其它一些情况。在法国尤

其是在西班牙（在这两个国家里，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成立了自由党、国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人组成的政府），对人民阵线政策的实际运用提供了进行新型合作的独到经验，这种合作没有按照苏联的规矩办，但看来却适宜于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人民阵线取得的经验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这种经验虽属过去之事，但却给人留下了教训，欧洲共产主义者研究一下这种教训是会有好处的。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西班牙共产党在确定欧洲共产主义态度方面比其它党走得更远，一个可能的答复就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西班牙共产党首先（于内战期间在共和派领土上）同其它党一起在多元基础上并在自由的政治辩论的气氛下参加了政府。我这么说并未忘记一些比较消极的事实，例如：由于把斯大林主义从苏联搬到了西班牙，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受到了镇压。

另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时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它国家成立联合政府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同社会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以及其他反纳粹力量进行了合作。在此

阶段，有些党甚至开始设想是否有可能用民主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过程由于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和强制推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而停了下来，因为情报局规定：进行革命只有一种方式，即俄国方式。

我之所以引用这些例子，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揭示了一件深刻的客观事实，这就是：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自己产生了这样的压力：要求确立一种有别于第三国际在苏联典型的影响下强使人接受的政治实践和战略。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看待欧洲共产主义的话。

同苏联典型的最终决裂的速度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大大加快了。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斯大林主义不仅造成了刑事上的镇压，也造成了苏维埃制度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深远的缺陷。从一九五六年起，把各共产党同苏联连在一起作为它们唯一营养来源的那条脐带断了。各党于是开始了制订自己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态度，直到经过多次的浮沉和成败之后，西欧的若干共产党获得真正的独立。

欧洲共产主义实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一九六八年。原因有二：第一，一九六八年五月

巴黎爆发的大事件戳穿了认为战后的新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幻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八年，西欧的思想方式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的，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解决自身矛盾的办法；认为劳工运动正在“合并”到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经济繁荣已排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一九六八年的事件表明，丝毫未被合并的劳工运动仍旧是一支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战斗力量，不仅如此，它还迎来了一些同样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社会力量——技术人员、科学家、知识分子、专门家，亦即社会上的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的人数和影响由于进行了科技革命而有了稳步的增长。

第二，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布拉格之春”已证明是一种经过慎重考虑的行动，以便使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使得西方的共产党迫不及待地认识到，它们必须摒弃“苏联典型”，同苏联人分道扬镳。它们认识到，它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它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同苏联的制度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因为苏联的制度现已证明不仅是要镇压基本自由，而且还要采取有损国家独立和违背进步

运动及世界革命利益的一些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出现使人不得不以比过去更认真得多的态度去研究苏联典型的全部含义及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威信的原因。有必要去分析苏联社会的全部特征、揭穿它的神话，同时也对东欧各国的社会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实的反应；其次也是对苏联社会、尤其是其消极方面——它沒有资格充当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进步的典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反应。

导致欧洲共产主义的过程采取的是独立自主的方式，并具有多种民族特色，尤其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日本、英格兰、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共产党里是这样。这些党出于适应具体形势的需要，被迫声明它们不受苏联共产党的支配而进行独立思考。这种情况也鼓励了各种态度的出现，最终归结到我们所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

这个过程是变化多端的。这就说明，不能把欧洲共产主义看作是一整套理论，更不是一个

组织。没有什么欧洲共产主义的中心，没有什么欧洲共产主义的组织，也没有什么欧洲共产主义的纪律。这样一来，有些人便赶忙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说什么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所特有一些民族现象和态度。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忽视了基本的一点，那就是：通过一系列互相没有联系的过程，一些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汇集到了在许多方面形成一致的立场。最重要的是，它们一致认识到，西方社会只有通过民主过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这些国家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一心想实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享有自由的社会主义，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却分别集中到了这个中心点。这个事实着重说明，我的结论是妥当的。它表明，我们并非应付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安排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自然的结局。

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迷惑反对我们的人的骗术吗？在制订共产党的政策时有时候显然是要作策略上的考虑的。但是，一些共产党——正好是深深扎根于西欧群众的那些共产党——竟然得出了极其一致的结论，而且正在说服它们的普通党

员和党的同情者，要他们相信，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就是民主道路。这个事实不可能是一种策略行动，而是一种崭新的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同苏联典型这个神话，同斯大林极权主义及其后果实行了决裂。它是在科技革命时代设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办法，因为科技革命提出了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世时所无法想象的问题。

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不是来源于正统观念同异端之间的任何分裂。这种多元化首先是来源于近来使革命运动逐渐形成的各种客观条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持续地无法解决已摧毁资本主义但却一直未能超脱“原始社会主义”的那些社会的内部问题。这种多元化来源于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即便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消失之后，由于国家的存在——且不说国家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造成的矛盾。

在这个多样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欧洲共产主义无疑地是主流之一。它代表着世界上工业、技术和科学人力最集中的地方很大一部分体力劳

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需要。

有些评论家把欧洲共产主义说成是恢复到社会民主主义。这样看待问题是犯了只作比较而不考虑不同的历史角度的严重错误。显然，欧洲共产主义目前的战略是集中在尊重民主法则；它深信，必须通过普选去实现历史性的变革。如果以此作为我们的起点，那就使人有兴趣去同第二国际相信投票箱力量（迷信选举）的作法作一番比较，其结果就是，在属于社会党国际的党派组织政府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因为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在政府执政的时候就失败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目的恰好相反：它是要取代资本主义——尽管用的是民主手段——以便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为迅速走向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今天，用民主方法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是全然不同于本世纪头几十年的客观条件的。欧洲共产主义充分反映了科技革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条件，也反映了热心于结束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力量有了惊人的增长。热心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仅是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者阶级，在这一事业中同他们携起手来的还有科学家、技术人

员、各行各业的人以及知识分子这些广泛的阶层——一句话，就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称之为“文化力量”的那个社会阶层。这些人同资本主义的统治发生了矛盾，不仅是因为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是靠工资维持生活，也因为他们从事科学和文化的创造性工作所需要的那种精神状态，同他们不得不服从资本家（资本家的金科玉律就是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的决定这个事实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是个新的因素，对用民主方法来实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巨大的潜力。

中小商人的情况同这类似。这个阶层同资产阶级社会有着无可否认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它的态度一向是保守的和趋炎附势的。然而，这个阶级的人经常发现自己同垄断资本的利益处于深刻的矛盾。许多小商、经理和企业家事实上是领取薪金的人，他们的“薪金”就是银行贷给他们的贷款。“私人企业”所具有的这种机会正在减少，对他们来说，在社会的民主机构指导下的国营部门同私人企业部门共存的条件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显得比他们所处的越来越受到暴虐寡头政治的压迫的现状继续下去要有希望得多。因此，在这一部分人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

人拥护以民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对中产阶级和中小商的态度不是玩弄策略。我们同意这一点，即：服务性事业和某些商品的提供现时跟过去一样还必须依赖私人企业。不考虑到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就会使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只有私人企业才能满足群众的各种各样的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决不会为公众所接受的。

但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只限于这样的主张：它必须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它试图去解答随着科技革命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它迫不及待地需要解决而在一个受资本主义谋取利润原则指导的社会中又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

拿妇女解放的问题来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分明显的是，由于近来的科学发现、现代的避孕用具，等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我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妇女低于男人。这就是说，妇女不仅充当后备劳动力，还要执行她们无偿的任务，通过家庭去繁殖劳动力。从意识形态上说，妇女在家中降到低等地位，是保持资产阶级家庭所

特有的那种百依百顺态度的必要先决条件。爭取妇女解放斗争的成功意味着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改造社会。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结束本身将意味着妇女的平等。爭取女权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必须继续下去，因为歧视妇女的根源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有开展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才能铲除这个根源。

现在来谈谈都市化、先进工业国里强夺大片土地和打乱生态平衡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经济发展实行计划和控制，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而是作为一种公众道德的行动。此外，要实行经常的或反复教育的新前景，必须先有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风气，一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风气，去确保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真正受益者。

如果说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可以谈到不同国家大多数人的革命，那么欧洲共产主义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实现世界范围内意见广泛一致的政策的方式：一种人类大多数人的革命，这种革命必须引导人类达到更高形式的文明，其基础不是私人利润，不是资本，也不是人对人的剥削，而是某种集体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理想的实

现同时也意味着自觉地参加到历史过程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共产主义要求进行一种源于群众和发自群众的革命——一种将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充分的真正民主：这将首先保证走向社会主义，然后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在自己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间保持着距离。这里不宜细述有史以来的头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独裁政权、变成了通过非民主手段把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的专制主义的原因和过程。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这条社会主义原则同苏联的实际做法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意味着，劳动群众如果不是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到剥削，却是缺少自由而且受到了冷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受到压迫，因此，苏联的国家便保留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特征。享有某些明显特权的少数人便利用了这个国家去统治广大的人民群众。

造成这种奇特过程的两个决定性的原因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俄国的生产能力水平很低，紧接着帝国主义又进行了干涉，迫使年幼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中央集权和凭借武力去贯彻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政策。不容置疑的是，头一次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时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的性质，势必使得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的许多特征只存在于苏联的初期阶段。这些初期阶段过去之后，苏联共产党（它的作用是作为工人的政治先锋队，领导工人进行反对过去的残余的斗争和走向高级社会）实际上被国家所吸收，同国家溶为一体，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斯大林主义在理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赋予国家以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主义是这样一种政策：它给国家以绝对权力，并使国家成为新社会的塑造者。我们都知道这种政策会带来什么实际后果！

纵令苏联的压迫不再象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厉害和残忍，国家的理论和运用仍带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的印记。例如，很难令人相信的是，在一个强烈而广泛地要求民主的世界里，苏联竟然能举行候选人得票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选举——何况这种选举根据其性质来看并不能代表民意，而只能使坚持安排选举的人声名狼藉。谈到理论领域，显然（除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朝这个方向采取的某些步骤之外）是不允许进行真

正的历史研究，连这种想法都是遭到禁止的。在苏联，历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是从属于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兴致的。在最初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其正式意识形态、即唯物史观的国家里，当代历史竟如此被贬成仅为个人统治的历史，被贬到了充当达到政治目的之工具的地位。这实在是一条十分严重的罪状。

因此，在不否认苏联由于沙皇俄国的落后而在教育、卫生等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员虽然多年来把苏联说成是一个比较高尚、比较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典范，却不得不对苏维埃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苏维埃国家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没有达到我们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

到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强制力的国家是注定要消亡的。显然，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想在世界上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那些地方取消国家，那将是痴心妄想，或者简直就是自杀。问题不在于国家并没有在苏联消失。问题在于，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保留着一些非民主的特征，如专制主义、没有自由，

等等，这些特征往往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群众还争取到了很大程度的政治民主。（附带说一句，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现在正通过令人感兴趣的多元论新概念来着手解决国家消亡的问题。）

对欧洲共产主义来说，问题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来的。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倾向于缩小民主的范围和有效性，不让选民发挥作出重大政治选择的意志。且不论经常回到暴力和法西斯恐怖活动的做法，明显的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的趋势是，加强行政机构和上层官僚机构的作用，而削弱议会的作用，即削弱人民直接选出的机构的作用。这说明，在所谓英国式的自由民主达到“顶峰”的时期行时过的一些原则已经蜕化了。与此同时，在管理人员一级，我们可以看到，经理和其他决策人物同广大干实际工作的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不仅仅是同工人阶级疏远了，也同日益扩大的脑力劳动者、技术人员、科学家等等的关系疏远了。

垄断资本让少数关键人物作出决策的趋势同争取民主、自由和创造性的需要发生了矛盾。整

个生产过程表明，招收科技人才的数目有了惊人的增加，这意味着同时也需要人在政治领域自由地发挥创造性。对自由和民主的需要带上了政治哲学的因素。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是符合扎根于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的现象的，也是这种现象的政治表现。

许多在过去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发生分裂的直接原因的那些问题，今天却处在不同的阶段。有鉴于此，全体欧洲左派迫切需要本着自由辩论的精神来处理这些新问题，既不抱偏见，也不受过去经验的约束，以便尽可能具体地弄清楚在哪些方面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可以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哪些方面他们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分歧。这种辩论应该着眼于未来，应该勾划出一条多元化的前进道路，好让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那些具有天主教和自由主义思想、但一致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方针对社会进行结构改革的人们能沿着这条道路去创造一个新欧洲。

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对于我们走过的历程的一个阶段中出现的一系列缺陷仍在进行自我反

省。我们正在寻求和争取实现一个新型社会，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的方式，一种多元化的方式，一种生活在自由中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自我反省也是重要的。在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治理的国家中毕竟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得到了改造的。由于认识到了这种失败，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些人正在进行认真的自我审查。这个过程可能产生重要的结果。

西欧正处于空前规模的危机之中。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和经济潜力，同时也出现了劳资关系的混乱和明显的政治和道德堕落的迹象。西欧的情况着重说明，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民主方式去实现一个人民的欧洲、工人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欧洲。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我们自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在欧洲范围、也许甚至是在国际范围开辟新境界的一部分。

还有欧洲共产主义者看待事物的方式；毫无疑问，这方面是有差别的——对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以及西欧各国间关系的问题，法共、意共、

西（西班牙）共是有自己的评价的。

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赞成西欧的联合。我们认为，西班牙必须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反对大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对欧洲经济的统治。我们不打算在问题产生和形成的时候在共同市场结构的边缘去完成这个任务，而是着眼于这些结构的核心，使它们民主化，增加工会的代表和影响，推进工会在欧洲范围内团结一致的过程。同样，我们将寻求新的办法把跨国公司的工人团结起来，这些办法将在面对垄断资本权势的情况下促进工人组织的发展，使之能导致工人阶级在国际水平上、亦即跨国公司活动的水平上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通过普选选出欧洲议会是向前迈出一大步。由于西班牙不大可能在选举欧洲议会的时候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成员，我们认为，必须制订一种特别方案使西班牙人民能参加这次选举，并让他们的当选代表不论以什么名义参加欧洲议会。多年来欧洲的整个民主力量就是在“争取西班牙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现在，西班牙已开始走上了民主道路，如果在这时通过把西班牙人排除在外的普选选举第一届欧洲议

会，那真是咄咄怪事！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有大量西班牙人在其它欧洲国家生活和工作，那么上述做法就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了。这些西班牙人生活在两个国家，一个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的国家，一个是他们有着家庭、政治和文化联系的祖国。凭什么可以剥夺这些工人在第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呢？

此外，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认为，走向西欧联合的过程必须具有我在前面已谈到过的一些民主考虑所形成的政治含义。这指的是欧洲的联合防务，尽管这个问题还没有达到具体化阶段。

现在来谈谈欧洲同世界其它地方的关系的问题。欧洲共产主义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我们承认前殖民地现在在世界上起着新的重要作用。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一个确保了工人支配权的西欧将处于同第三世界开始建立新型关系的良好地位，这种关系中将不留新老殖民主义的任何残余。我们必须抛弃“援助”这个反动概念。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今天已成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工业先进国家发展的一个条件。这种看待事物的新方式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态度，决不能同资本家谋取利润的作法有任何牵连。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如果想象在左派力量——而且是所有进步力量——还很弱的美国就能着手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一方面，西欧不仅有经济及科技潜力，而且已处于政治思想的先进阶段，使西欧人能够设想把工人和知识分子占支配地位当作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是能够用新办法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也是能够找到新的途径来调整北方和南方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或不够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而且，正是由于欧洲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代表了希望在整个欧洲发挥较大作用的南方劳动群众的态度，我们认为，同第三世界建立新关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欧是否接受我们谋求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民主和多元化纲领。

一个似乎使许多评论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欧洲共产主义怎么可能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攻击和批评对象，而且其措辞常常是大同小异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什简单的答案的；起作用的有多种因素，但其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欧洲共产主义给人以一种处于把欧洲一分为二的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选择。

人们甚至可以说，欧洲共产主义是欧洲在这两个集团之外的唯一选择。

我们的看法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欧洲，就跟美国和苏联是独立的一样，这个欧洲对于所有国际问题都应有其自主的政策。我们所希望的欧洲将本着友好的精神既同美国和中国进行合作，也同苏联进行合作。我们所渴望的欧洲将同强大的、现已充分成熟的不结盟国家运动一起，成为克服当前世界两极化斗争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两极化正在开始减弱。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对全人类来说重要的是，两个拥有毁灭人类的手段的超级大国应确认和平共处的原则，维持相互的关系，并防止发生核屠杀的威胁。可是，两极化往往使得无法对某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尤其是裁军问题进行有成果的讨论。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决不能继续有赖于“恐怖平衡”。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中小国家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欧洲共产主义对待一个联合的欧洲的态度可以大大有助于使和平共处得到急需的推动，冲破国际问题的僵局，加强各国的独立，并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自己掌握自

己的命运，和以民主的方式来自行决定如何生活，以及现在和将来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欧洲共产主义十分重视制订自己的理论基础。西班牙共产党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研究工作，而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是存在着广阔的领域的，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新出现的特点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工业先进国中出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许多特点不同于马克思或列宁在他们的时代所研究的那种国家）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关心的是鼓励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自由地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些怀有看来是要恢复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原则野心的人已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攻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看到有人顽固地回到虚无主义的狂热，用它来为多半是最黑暗的反动势力所干的恐怖活动进行辩解。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次理论上的反击是符合劳工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利益的。所谓“反击”并不意味着重复一些口号和时髦话，而是应该恰恰相反。我们

需要做的是加强我们的分析方法和使我们的思想臻于完善。

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恰好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正式意识形态的那些国家里大大地不吃香了。列宁逝世之后，“列宁主义”这个词被想要夺取对苏联共产党的控制权和想要继续保持对该党的控制权的各派，当作了说明自己的正统性的工具和口号。过了不久，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三十年代中，这种正式理论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种退化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堆教条、“绝对”真理，还指定了一个宗教法庭来监督其执行情况。实际上，这个苏联的宗教法庭就是一个人；最后终于到了这样的阶段，即斯大林的著作可以被说成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等五花八门学科的最后定论。他的话不仅想要成为绝对真理，而且被认为是在每一个问题上的绝对真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称有权把一种极权主义思想强加给一切思想领域。这就是唯我独尊的共产主义的教义。

不幸的是，这种唯我独尊的共产主义的残余，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成一堆教条的做法，

仍然出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自认为有义务予以捍卫的某些理论中。一些其它的共产党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党继续把凡是出于苏联的东西都当成了圣旨。

苏联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存在一部权威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书。这部全书被压缩成了苏联的一种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的出版物，这本出版物是苏联和一些其它国家的中学和大学的必读物，具有教义问答的性质。苏联近来对西班牙共产党所支持的一些理论的一系列攻击说明，有些人自认为是宗教法庭的发言人，因而有权宣布把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人革出教门。这种革出教门的做法的效果几乎没有超出宣布开除的条文的范围。

西班牙共产党多年前，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谴责了斯大林主义之后，便采取了重大步骤来消除斯大林主义在其思想形成过程和政治行动中的残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欧洲共产主义都反映了同斯大林主义及其余波的决裂。

从我们的日常方针和我党的内部活动及组织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不把强制性思想强加于人，我们不作任何道义上的规定。对我们来说，

共产党内同时并存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关于宗教信仰，今天在西班牙共产党内，信仰宗教的共产党员和不信仰宗教的共产党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持这两种态度的人都同样是共产党员。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中——说实在的，就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些人就是天主教里的知名人物。

这不是搞折衷主义，更不是回到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这是对我们的思想过程的锻炼，使其达到能恰当地应付当前问题的地步。这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科学的、注重方法论的因而也是革命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它发现了解决人类历经沧桑的历史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新方法；它是历史的科学，历史性变化的科学，因而也是革命的科学。

列宁主义是一九一七年使俄国爆发了世界上头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政治实践。这场革命头一次推翻了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开始了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改造世界的过程。这场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轻视的。我们的一些共产党正是

在这种经验的火焰中诞生的。当然，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列宁主义的学说受到了列宁从事活动的历史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可是我们认为，列宁的远见卓识超出了俄国的范围。我们相信，列宁主义思想当今对我们是具有正当的影响的。当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研究列宁的著作时，我们发现它是启发我们制订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十分丰富的源泉。但是，我们不把列宁当作永恒的神。我们认为，还有一些人可以在列宁旁边占有他们应有的位置——例如罗莎·卢森堡、毛泽东，尤其是葛兰西。他们也可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所急需的启示和经验的源泉。

因此，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改变了我们在此之前用来说明我党性质的措辞。我们放弃了说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或“列宁主义”党的做法。我们不再把列宁主义说成是鼓舞我们的源泉。我们给西班牙共产党下的定义是：它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一个民主的党，这个党的工作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和其他革命家的思想中继续行之有效的东西中得到启示。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十月革命是自己的传统的

一部分，对使人民获得了解放的其它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但同时，我们认为，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反民主的态度使得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间传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挫折。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由于自己的认真努力而顺利地渡过了这种斯大林主义的阶段，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反官僚主义的实质。

因此，我们彻底摒弃对马克思主义作任何教条式的解释。在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西班牙共产党毫不含糊地声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科学的，不是教条。”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将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以证明我们是能适应社会变革和科学所开辟的新天地的，也是能吸取革命实践的教训的。我们希望本着建设性批评的精神去吸收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新东西。我认为，这种对待在发展我们的理论的同时所出现的问题的新态度（尽管是新态度但它是尊重马克思主义最深奥的真理的）反映了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这种现象的深度和真实性。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共产党主要发言人。该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书记、党的理论刊物《我们的旗帜》主编。